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波谲云诡，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下，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科学分析研判今年上半年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会更加认识到加快促进这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具有极端的必要性，应该成为未来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和着力点。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运行呈现出深V型恢复变化态势

从经济运行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的，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呈现出深V型恢复的变化趋势。从中国经济一季度的数据看出，虽然总体上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降6.8%，但是如果对比3月份和1—2月份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三次产业的增加值，还是就业、投资、消费等其他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增速反弹、降幅明显甚至大幅度收窄的特点。而4月份和5月份的数据，进一步说明了中国 经济正在从这次强度前所未有的巨大短期冲击中逐步恢复过来。市场预期保持平稳，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连续3个月保持在临界点以上。也就是说，截至5月份的数据，1—2月份的数据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谷底”，3月份以后逐步开始恢复，基本呈现出深V型恢复的态势。

从4、5月份的经济运行指标，再考虑到6月份疫情流行曲线状况和我国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虽然北京出现了新疫情会有一些影响，但初步判断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大概率能够转正。如果不出现太大的突发情况，下半年应该可以逐步回归正常水平，明年迎来中高速增长。但5月份不少指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这表明中国

从当前经济形势看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黄群慧

经济深V型恢复基础还有待进一步筑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着力稳企业保就业，狠抓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地，纾困政策应该保持到年底，同时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生态和深化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落实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政策，继续坚持“短期纾困与长期创新相结合”的政策思路。

从国际经济看，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和对中国供应链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引发了全球经济的持续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和5.2%。从贸易上看，一季度全球贸易额同比下降3%，二季度WTO货物贸易晴雨表指数为87.6，创历史新高，WTO预计二季度全球贸易额同比下降18.5%，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二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额将比一季度下降26.9%。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看，一季度美国、欧元区和日本GDP同比下降4.8%、3.1%和3.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GDP将分别萎缩8%、10.2%和5.8%。面对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衰退，各个经济体采取了

一系列超大规模的经济救助措施，这将有助于经济逐步恢复，由于迄今为止美国等国家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再加之医学界有预测认为疫情还可能在今年秋冬季节卷土重来，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将十分艰难，甚至有可能呈现W型恢复的基本趋势。世界经济的持续衰退和可能呈现出的W型恢复态势，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的深V型恢复态势与世界经济可能呈现出的W型恢复态势之间会产生巨大的“不同步缺口”，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个“不同步缺口”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国际经济循环以及我国经济呈现深V性恢复趋势的基础。

疫情冲击以及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更为长期的影响在于可能会冲击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在全球的地位。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巨大冲击。对于中国产业而言，1—2月份主要表现是，中国国内疫情暴发后中国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率先按下暂停键，对全球供应网络形成冲击，出现大量延迟交付和订单萎缩；进入3月份后，日本、韩国，进而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欧洲地区、北美地区都面临巨大疫情考验和挑战。虽然中国复工开工率不断提升，但此时外部疫情开始严重影响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疫情对中国的冲击与对其他国家的冲击开始产生交互性的负面影响。这必然从国际循环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影响。

不仅如此，从积极应对疫情冲击角度，各国都会从供应链安全角度进行供应链的调整，这必然会加剧去全球化的趋势。由于近些年贸易保护主

义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全球供应链已经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而疫情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巨大冲击，会加重这种趋势，全球供应链布局会面临巨大调整可能，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安全与全球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我国在考虑短期“六保”中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同时，必须从长期角度思考如何在产业链安全和产业链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从加快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看，我国要从疫情冲击下的“被动型”转向政策驱动下的“主动型”

如果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量上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国内经济循环主导的基础条件。一方面从生产供给角度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另一方面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2019年中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 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总体而言，我国已经步入到工业化后期，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形成了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的要求，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

的经济效率基础。

但是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经济开始内卷化。这里必须避免一个重要的错误倾向：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和一些国家努力推动“去中国化”等原因，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短期会受到明显抑制，我国的供应链会受到侵蚀，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而言国内经济循环量“此消彼长”会大幅提高，由此就贸然判断或者宣布我国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这种被动形成的国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并不是我们期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们要实现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积极拓展国际循环、国际循环的流量保持增长的前提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供给质量、挖掘国内巨大消费潜力形成的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实现这样的国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继续对外开放、进一步拓展外资外贸工作前提下，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供给质量，挖掘我国消费潜力，在提高我国国内自我经济循环量的同时，还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这本质上也就是促进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从“被动型”转向“主动型”的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种转换不仅仅是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战略出发点和

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 王爱民 张鹏

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力度，破解互联网底层技术“卡脖子”难题。

应用巨大的市场催生了丰富的互联网应用场景，推动了消费互联网领先发展。在工业互联网阶段，应继续发挥中国巨大市场的优势，探索应用场景创新，加速对教育、医疗、出行、金融、零售、文旅、政务等垂直产业连接。加快布局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项目，继续保持中国互联网应用的领先地位。同时，需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激发互联网企业内在的创新动力，鼓励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并发挥政府对创新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瞄准区域、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助力协调发展

工业互联网发展要配合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引擎。支持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互联网产业发展实力较强的省市加强政策创新，鼓励先行先试，探索工业互联网新模式，激发新动能。制造业基础好的地区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工业互联网应用和企业上云，搭建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据采集互联体系，促进制造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提升模块化设计、柔性化制造、定制化服务等能力。中西部地区要抓住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机遇，因地制宜落地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发展在线特色产业链和虚拟产业集群，培育增长极和竞争力。

工业互联网发展要助力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提高城乡数字化治理水平。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各地政府开始建设“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民生服务平台，电子政务、智慧交通、智慧金融、智慧医疗等各领域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在新发展阶段，让工业互联网全面融入城市发展，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为城市发展和治理赋能。基于“云-边-端”的技术架构构建支持分布式、多中枢联动的智慧中台，为化解“城市病”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工业互联网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重视农村5G网络建设，构建农村大数

据平台、农业互联网和农业物联网，发展精准农业、智慧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深入挖掘工业互联网的应用需求，使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科技成为新时代农民的“新农具”，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巩固脱贫成果。

发挥工业互联网提效率降成本的优势，推动绿色发展

工业互联网通过信息流引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有效利用，为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了重要支撑。以研发活动为例，在传统模式下，研发活动人力投入多、耗资大、周期长。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科研数据的深度分析，推动科研从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范式进入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阶段，显著减少研发活动的人力投入、减少资金消耗、缩短研发周期，加速科研进程与科技成果转化。工业互联网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和相关产业的高速成长，实现以降消耗降成本为前提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互联网自身的发展特征也存在一些与绿色发展理念不匹配的问题亟待解决。以支撑未来工业互联网发展的5G网络为例，高功耗是困扰5G网络发展的难题。据测算，4G基站功耗为每月1300瓦，5G基站典型功耗为3500瓦，为达到同样覆盖，5G基站数量是4G的3—4倍，5G网络的整体能耗达到4G的9倍以上。电费等成本的上升传导到网络流量费用，很可能会抵消工业互联网带来的效率提升，进而影响产业竞争力。一方面要推动技术进步来降低功耗，另一方面可通过财政专项补贴鼓励企业使用5G网络，扩大用户基数，降低边际成本。

构建开放平台、完善数据规则，厚植开放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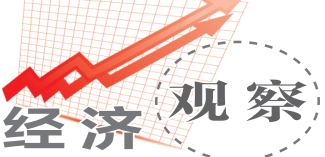
互联网天然具有开放的基因。持续推进开源协同创新生态，充分依托头部企业的科技实力，有效输出“项目甄选、特征孵化、持续运营、安全风险”的全流程开源治理经验，探索打造开源协同创新平台。推动跨行业合作，构建开放工业互联网生态和协同创新集群，打造工业互联网“朋友圈”。

数据驱动是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核心特征之一，数据对于工业互联网的重要性好比石油与汽车的关系。我们对于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规律的认识还处于探索期，数据的产权界定、市场配置、保护模式等方面都存在诸多有待探索的议题。探索数据分级分类，对于政府部门的公共数据，以“数据中台”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将散落在各个政府部门的公共数据汇聚到统一的开放平台，进一步推动数据资源开放，为工业互联网发展注入丰富的数据资源；对于主要产生于企业的社会数据，坚持市场化原则，尊重企业数据权属，确立数据财产权益保护与健康竞争秩序，构建数据信任，激励数据产权，实现数据有序流通，形成健康有序可持续的数据生态。同时，加大网络安全投入，保护数据安全，为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坚持包容性普惠性发展，促使成果共享

相对于消费互联网的高集中度，工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长、市场容量更大、市场需求更复杂，“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不再适用，应以“共创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坚持包容性普惠性发展，深耕产业链具体场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头部企业带动中小微企业共同成长。应从降低成本、引流拓客、设立专项基金、技术开源等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帮助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医疗、文旅等六大领域数字化转型。

技术进步改变就业结构，对于劳动力同时具有增强效应和替代效应。工业互联网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自动化智能化带来就业岗位替代，对部分传统产业和原有的就业岗位造成冲击。鼓励拥抱新技术，把数字化技能纳入职业教育培训体系，通过职业教育和技能提升稳步实现就业迁徙。这要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完善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式相关的保障制度和政策。针对就业困难群体，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政策储备和兜底保障。



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如何彰显

□ 余 茜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为此，《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这为完善竞争政策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一是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市场、政策、法治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激发活力和创造力。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二是推进地方政府简政放权的实质性突破。明确地方政府审批管制事项“只减不增”，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代码体系，使清单事项与行政审批体系紧密衔接、相互匹配。更大范围内探索关联领域审批事项改革，确保关联、相近类别审批事项“全链条”取消或下放；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手续，推进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三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事项，从根本上解决“准入不准营”的难题。全面梳理各种行业准入许可、产品生产许可、服务许可和职业资格等，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证照分离”改革，大力推进“照后减证”。当前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降低企业税负的重点、难点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拓展执法深度、提升执法效能。《反垄断法》是实施竞争政策最核心的工具，其实施10多年来，有效推动了竞争政策理念的广泛传播，下一步重点应从修法 and 执法等方面加以完善。一是要加快《反垄断法》修订工作，形成以《反垄断法》为核心，以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

政策思路导向问题，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值得十分强调。

“主动型”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一蹴而就的。围绕着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对疫情冲击，当前在政策安排上，一方面从需求侧入手扩大有效投资和促进消费，重点是加快“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的投资和积极出台一系列针对居民的消费激励方案；另一方面从供给端发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我国经济循环中的技术“卡脖子”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提高经济供给质量。具体而言，现在有必要下决心对长期以来阻碍国内经济循环、老生常谈的结构性问题、体制机制问题进行“动手术”。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一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要按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切实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通过推进公益性企业回归公益定位实现国有经济战略功能，通过推进商业类企业回归企业属性实现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久。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是建立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政策体系 and 实施经验都已具备，改革再进行试点的意义已经不大，需要全面切实推进，国资委要放开“试点权”，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各方面改革。另一个问题是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第一季度经济下降6.8%、工业企业利润下降36.7%，而银行业利润率却保持了增长5%。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金融让利实体经济。这要警惕以防金融风险的借口来保证金融业的利益，重视金融的短期风险与实体经济长期风险的平衡，下决心解决阻碍我国经济有效循环的“脱实向虚”的长期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章、规范性文件和反垄断指南为补充的竞争制度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竞争制度规则的完善程度决定了竞争政策实施的力度。二是进一步增加并细化《反垄断法》的具体规则和内容，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和第三方评估机制，以服务业为重点试点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建立市场准入评估制度，定期评估、排查、清理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信息公开机制，提升准入政策透明度和负面清单使用便捷性。通过规则的细化为提高反垄断执法的可操作性、提高执法透明度提供明确法律依据，通过强化制度指引和预期引导，便利社会监督。三是通过透明、高效和及时的反垄断执法，提高违法成本，预防垄断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损害，确保执法程序更加合理和全面，更具透明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反垄断法》执法的经济分析，实现执法精细化。

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修订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当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作为国家顶层设计和战略性制度安排，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的制定出台就是主动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衔接与协调，有利于形成制度合力。下一步，要破除妨碍公平竞争审查的重要体制因素，统筹协调综合性的市场监管与专业性的部门监管，形成监管合力；统筹做好增量审查和存量清理，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存在政策，对反映比较突出的领域，要实施专项治理；督促部门和地方修订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细化审查标准，明确审查机制，确定时间表；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抽查、考核、公示制度，建立健全第三方审查和评估机制；建立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监督机制，畅通违反公平竞争问题反映和举报的绿色通道。

